

# 企业生产组织与贸易关系研究进展\*

汪良军 吴 宏

**内容提要:**企业生产组织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本文对企业生产组织与贸易关系研究的相关理论进行综述性分析。首先,分析任务离岸的相关研究;其次,对企业生产组织内部的匹配问题与贸易关系进行分析;再次,分析国际维度的企业边界理论;最后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离岸 匹配 企业边界 贸易

企业生产一个产品由一系列的活动组成,这些生产产品的活动集合在经历第一次“松绑”后实现了斯密意义上的专业化劳动分工,随着交通成本、信息交流成本以及其他贸易成本的降低,企业生产的活动集合迎来了第二次“松绑”,专业化生产的实现与地理分布上的分散化,带来了企业内贸易或中间产品贸易(Baldwin & Nicoud, 2007)。当一个企业把一部分生产活动在其他国家进行,然后进口这些中间产品,这一方面体现了中间产品背后的要素“影子迁移”,另一方面体现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变化;通过贸易,企业把其他国家的要素以及经济环境变量融入企业的生产组织过程,这将影响贸易模式、要素价格以及产品价格。因此,有许多学者致力于企业生产组织与贸易的研究。

## 一、企业生产任务的离岸化

完成最终产品需要一系列的任务,这些任务可以在国内开展也可以在国外进行,因此,哪些任务应该被离岸生产成为企业生产组织的一个重要决策问题。Deardorff(1989a, b)、Venables(1999)、Kohler(2004a, b)、Markusen(2006)、Grossman & Rossi-Hansberg(2006a, b)、Antras et al. (2006)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们认为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环境不同,在贸易成本与沟通以及信息成本下降时,企业可以通过对生产任务进行离岸化节约成本,获取更高的收益。Dixit & Grossman(1982)的模型考察了多阶段生产系统如何在不同国家分配工序阶

段,并分析关税等政策变动对这类国际分工的影响。Jones & Kierzkowski(2000)指出有两个因素推动生产过程分离化(任务离岸):一是比较优势因素,二是规模报酬递增因素。Yi(2003, 2008)解释了贸易对于关税降低的非线性或放大反应,垂直专业化的中间产品在不同国家生产,跨过不同的国界进行贸易,每次贸易都会因为关税下降而节约成本,多个垂直专业化的中间产品贸易可以放大关税下降的成本节约效应。

企业生产任务离岸的收益与成本影响企业国际生产过程的组织决策。任务离岸生产的收益一般由要素成本的节约来确定,而任务离岸的成本由任务的特性以及其他相关成本确定。不同任务的离岸生产成本不一样,因此,有些任务比较适合离岸生产,而另外一些任务可能非常难或者不可能离岸生产。任务的特性影响离岸生产的成本,根据离岸的成本大小,OECD把可以离岸的任务或工作分为四类:IT密集型的;产出可以通过信息技术转移的;可以编码化的;很少需要面对面相互影响的。根据这个标准,美国大概有20%的生产可以离岸化。Baldwin & Robert-Nicoud(2007)认为满足两个条件的任务离岸成本比较低:第一个是有关技术的条件,沟通成本必须足够低,使得对在不同国家工作的员工进行远距离发布指令具有经济性;第二个是有关代理人监督的条件,包括可以通过工作指南或规则进行操作的惯例性任务与容易编码化的任务,或者一些简单组装任务。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产业集群导向的跨区域群体投资机制研究》(70773105/G0304)阶段成果。

企业生产任务的特性影响离岸生产的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离岸的任务类型,不过,离岸生产的成本同时也受到信息交流技术与关税以及运输成本的影响,而这些离岸成本与离岸收益将共同决定均衡条件下的离岸任务。Grossman & Rossi-Hansberg(2008)与 Baldwin & Nicoud(2007)分别建立模型分析企业任务离岸生产的均衡点。GRH(2008)模型把产品任务划分为两种,一种由具有相对少的技能或教育培训的劳动者完成的  $L$  型任务,另一种由具有高技能的劳动者完成的  $H$  型任务。假设产业中由低技能完成的  $L$  型任务  $i \in [0,1]$ ,并且假定只有低技能任务可以离岸且这些任务离岸成本为外生给定。记  $a_{Lj}\beta t_j(i)$  为  $j$  产业在国外生产  $i$  任务所需要的  $L$  型劳动力,其中  $a_{Lj}$  表示在本国生产时所需要的  $L$  型劳动力, $\beta$  为转换参数,通过它反映沟通技术对任务离岸成本的影响,技术越先进, $\beta$  取值越小,不同任务的离岸成本  $t_j(i)$  不一样。设  $w$  与  $w^*$  分别为本国与外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如果  $w > \beta t(i)w^*$ ,那么本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处于  $[0,i]$  的任务进行离岸是有利可图的,因此,本国企业任务离岸的均衡点  $I$  应该满足:  $w = \beta t(I)w^*$ ,即任务离岸的边际工资节约等于任务离岸的边际成本。

Baldwin & Nicoud(2007)(下文简称 BN 模型)通过修改  $H-O$  模型把任务的离岸化纳入形式化分析,在  $H-O$  模型中假定生产单位  $X$  需要劳动  $a_{LX}$  和资本  $a_{KX}$ ,把生产  $X$  理解为需要  $N$  个任务,即  $X_1, \dots, X_N$ ,每一个任务需要劳动  $a_{LX_j}$  与资本  $a_{KX_j}$ 。BN(2007)模型假定离岸一个任务意味着在国外采用本国的先进技术生产(技术满足希克斯中性条件,在国外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输入是国内的  $\gamma > 1$  倍),支付国外的低工资,因此,离岸始终有利可图。离岸可以降低成本,由于离岸生产会提高协调成本,且每个离岸的任务所需要的协调成本不一样,BN(2007)模型用冰山方法处理这些成本,即任务在外国所需要的劳动为本国需要的劳动  $a_{LX_j}$  乘  $\chi(X_j)$ ,其中  $1 \leq \chi(X_j)$ 。根据假定,当  $w a_{LX_1} + r a_{KX_1} > \frac{w a_{LX_1} r a_{KX_1}}{\gamma} \chi(X_1)$  时,即任务离岸的条件为:  $\gamma > \chi(X_j)$ 。

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间不同的经济环境以及贸易成本影响着企业生产任务离岸决策,而企业生产任务的离岸化对贸易也有着重要的影响。Jones & Kierzkowski(1990)的研究表明,任务离岸或者在不同国家组织生产环节对企业生产率有着重要的

影响;GRH(2008)模型研究表明认为,任务离岸对低技能劳动工资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的效应:生产率效应、相对价格效应与劳动供给效应。Baldwin & Nicoud(2007)模型认为任务离岸本质上相当于国外的劳动  $L$  与资本  $K$  向本国的“影子迁移”。BN(2007)模型研究发现,如果劳动迁移比资本迁移更多,则影子迁移降低了世界有效资本与劳动比例,那么资本密集产品  $Y$  的价格将上升。

## 二、匹配、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生产组织

当进一步深入分析企业如何组织生产时,从异质性生产要素的角度分析企业生产组织决策问题显得很有必要。在企业生产中,可以采用高技能的人力资本与一些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匹配,也可以聘用一些具有相似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从事生产,而这两种不同组织方式所体现出来的效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性质(超模性或次模性, Milgrom & Roberts, 1990)与人口中人力资本的分布。如果生产函数是超模的,任务是对称的,那么对输入的劳动者技能进行自我匹配更加有效率,即相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应该在一起工作;如果技术是次模的,那么劳动者技能应该交叉匹配更加有效率,即,对于任意四个劳动者,让最高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与最低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一起工作,把技能水平处于中间的放在一起工作。Kremer & Maskin(1996)认为人口中劳动者技能的分布要对企业生产组织产生影响需要在生产技术方面满足三个条件: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之间具有不完全替代性,不同技能之间具有互补性(超模生产函数假设);任务的产出对技能的敏感性并不一样;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之间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决定了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在企业内部充当不同的组织角色。只要一个企业生产函数满足上面三个条件,那么不同技能水平员工之间的匹配就会成为企业生产组织重要的决策问题。

Grossman & Miggi(2000)模型建立在 Milgrom & Roberts(1990)和 Kremer & Maskin(1996)的理论模型基础之上。研究发现,假定两个国家技术相同,偏好相同,如果本国人口中技能分布是外国人口技能分布的一个保均展形,即两个分布具有相同的均值,但是前者比后者更具多样性,那么本国次模生产的产品  $S$ (技能之间一对一的交叉匹配)就具有了比较优势,可以将产品  $S$  出口到外国,进口超模生产的产品  $C$ 。GM(2000)分析了人口中技能多样性影响异质性人力资本在不同产业上的专

业化配置,不过,当最终产品的生产由多个中间产品组成,而生产不同中间产品的任务具有原模型中生产函数的性质(次模或超模性)时,结合不同国家间在人力资本上的异质性,可以得出企业生产组织的相关结论:在保均展形意义下,如果本国人力资本比外国人力资本更具多样性,那么生产最终产品所需要的次模任务应该在本国生产,该任务生产组织体现了高技能人力资本与低技能人力资本之间的一对一交叉匹配;对于生产最终产品所需要的超模任务应该在外国离岸生产,并且该任务生产组织体现了两个相同技能水平人力资本之间的一对一匹配关系。不过,GM(2000)认为企业生产组织方面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模型分析企业生产过程中只是一对一的匹配,企业生产组织问题成为技能的配置问题,而没有考虑层级制的组织设计问题;另外,他们的模型假定两个国家人力资本的分布是对称且均值相等的,仅仅在方差上不同,这种假定离现实较远。

Antras, Garicano & Rossi-Hansberg(2006,下文简称AGR)模型与Grossman & Maggi(2000)和Kremer & Maskin(2003)模型比较接近,因为他们都研究不同技能工人在企业生产组织中的匹配模式与贸易模式之间的关系。AGR(2006)与他们的模型相比具有四个方面的不同:吸收Garicano & Rossi-Hansberg(2004)模型中一对多的组织层级制思想,而不是一对一的匹配(Grossman & Maggi, 2000),由于技能之间的互补,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一对多的内生性匹配可以提高所有劳动者的产出;管理者与工人的角色是根据他们的职业选择而内生的;团队生产函数内生于生产过程;管理者的技能与工人的技能之间关系受到沟通技术的调节,沟通技术越高,管理者知识就越发挥杠杆作用。

模型假定存在北方与南方国家,不存在贸易时,每个经济体中的劳动者只能与本经济体内的劳动者进行匹配,形成生产团队。在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形成管理团队的成员可以来自本国,也可以来自外国。AGR(2006)假定存在两种离岸均衡:低质离岸均衡(LQE)与高质离岸均衡(HQE)。LQE表示,南方所有人都作为劳动者,没有南方的管理者,他们都作为北方人的下级,在国际团队中工作;HQE表示南方的一部分人成为管理者,南方低技能的人为南方管理者工作,而相对高技能的劳动者为北方高技能管理者工作。

当两个技能分布混合在一起时就会出现南北方

劳动者的重新匹配。南方劳动者匹配得到了严格改善,因为原来一部分南方的管理者在全球化以后成为北方管理者的雇员,因此,南方劳动者匹配的管理者水平提高了。全球化以前的南方管理者,在全球化以后可能成为劳动者,但也可能保留了管理者身份。如果保留了管理者身份,其匹配的劳动者技能将下降。全球化对于劳动者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可以与更高技能的管理进行匹配,但是对于南方国家的管理者却增加了竞争。而原来一些具有中等技能的北方劳动者,在全球化以后,可能成为一些低技能者的管理者。

AGR(2006)模型把企业生产任务的离岸理解为异质性人力资本被分派到国际层级团队的结果,而国际生产层级团队的形成是管理者技能与劳动者技能匹配与职业选择的结果。为了分析工资结构,AGR(2006)简化了模型,着重分析两个层级的一对多团队,没有区分跨国公司内部与南方国家企业团队内部以及北方国家团队内部的沟通成本。AGR(2007)提出了比AGR(2006)更加一般化的模型:AGR(2007)分析了国内外传播知识信息成本的不同,AGR(2007)分析了包括中层管理者在内的三级组织层次。

### 三、不完全契约、企业生产组织边界与贸易

企业生产组织的边界如何决定呢?Coase(1937)、Williamson(1975,1985)、Klein, Crawford & Alchian(1978)、Grossman-Hart(1986)分别从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可占用准租金以及不完全契约等角度分析了企业生产边界决策问题。不过,我们可以发现从他们对企业边界所做的这些解释具有一些不足之处:没有考虑存在国际贸易条件下的一体化与外包决策;它们分析所得到的均衡是局部均衡,不是一般均衡问题。Antras & Helpman(2004, 2006, 2008)、Acemoglu, Antras & Helpman(2007)、Nunn(2008)、Grossman & Helpman(2002, 2004, 2005)、McLaren(2000)、Marin & Verdier(2002, 2003, 2005)、Feenstra & Hanson(2003)、Spencer & Qiu(2001, 2002)等等分析了全球经济中的企业边界决策问题(一体化还是外包),他们弥补了组织经济学研究中的缺陷。虽然这些文献的模型设计与假设不同,但是他们都实现了微观的契约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前沿的结合,通过引入不完全竞争与产品差异化理论(Dixit & Stiglitz, 1977),把局部均衡推广到一般均衡;通过在企业生

产函数中引入制度与经济环境变量实现企业边界决策问题的内生性(Antras,2008)。

从交易成本视角研究国际维度的企业边界问题的代表人物有:Ethier(1986)、Helpman(1984)、McLaren(2000)、Grossman & Helpman(2002)。Ethier(1986)认为一项交易在跨国企业内部进行与通过市场进行的主要区别在于,总部无法与中间产品供应商签订基于产品质量基础上的契约,因此,交易的事后有效性与剩余的获取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总部选择纵向一体化是可取的,并且在两国的相对资源禀赋差异比较小时更加应该采用纵向一体化。不过,Helpman(1984)的研究结果与Ethier(1986)刚好相反。

McLaren(2000)、Grossman & Helpman(2002)把Coase和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理论融入到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应用到存在国际贸易背景下的企业边界研究中。McLaren(2000)把市场上买卖双方匹配放在分析生产组织方式选择的中心位置。他们认为市场上非整合的独立供应商越多,市场稠密度越大,最终产品生产商可以更加容易地获得有吸引力的供应商所提供的中间产品,而如果市场上的企业大多数采用纵向一体化的内制方式,那么市场上的中间投入品供应商就少,市场稠密度变小,因此,纵向一体化行为的负外部性使得外包更加缺乏吸引力。自由贸易增加了生产商对中间投入品的选择机会,使市场变稠,改善了社会福利。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影响了企业的边界选择。Grossman & Helpman(2002)继承了McLaren(2000)的观点,他们把企业的内制外包决策放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分析,这使得外部中间投入品的选择变得内生性,从而内生性的决定企业边界。

Antras & Helpman(2003,2004,2005)围绕契约理论与国际贸易中的企业边界研究这个主题所建立的一系列模型融合了Melitz(2003)、Grossman & Helpman(2002)、Helpman & Krugman(1985)、Grossman-Hart(1986)的思想,这些模型成为从国际贸易视角研究企业生产边界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文献。

Melitz(2003)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通过研究企业生产率的差异与出口的固定成本这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Helpman,2006),解释了企业在服务本国市场还是出口到国外之间的“群分”(sorting)问题。Helpman, Melitz & Yeaple(2004)拓展了Melitz模型,他们除了考虑Melitz(2003)所分析的企业出

口还是不出口外,还考虑了横向FDI,即三者之间的选择问题。他们得出结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成为跨国公司,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不过,Melitz(2003),Helpman, Melitz & Yeaple(2004)研究了产业内企业异质性对国际化决策的影响,但是他们的理论强调产业内企业间生产率的差异性,没有考虑中间投入品的生产组织选择问题。Grossman & Helpman(2002)在产业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中分析了企业内生性的一体化与外包决策,在模型中引入了一个投入要素,但是他们假定产业内企业的生产率都是相同的。Antras & Helpman(2004)继承与发展了他们的理论,并且把Grossman & Hart(1986)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与Melitz(2003)产业内异质企业贸易结合起来,研究有关企业离岸后的纵向一体化与外包问题。

在Antras & Helpman(2003)的模型中,最终产品的制造商控制着总部服务,中间品的供货企业控制着中间品的生产质量和数量。假设总部服务只能由北方国家提供,而中间品可以在北方国家供应也可以在南方国家供应。相对于南方国家,北方国家具有制度优势。他们认为最终产品生产商所进行的不可契约投资要比中间品投资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度,而资本密集度与纵向一体化选择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对于总部服务(资本密集或高技术输入)密集度高的产业部门,企业采用内制化生产方式,对于中间投入要素(劳动力或低技术输入)密集度高的产业部门,企业采用外包化生产方式。从国际贸易视角来看,这个结论意味着:在行业层面,资本密集度与企业内贸易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即高资本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更有可能采用国际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组织。结合Melitz(2003)产业内异质型企业贸易理论,Antras & Helpman(2003)模型认为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产业生产,而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在南半球国家生产中间投入品。生产率在二者之间的,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在北半球外包,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在南半球国家外包,而生产率居中的企业选择在北半球一体化。

结合佛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Antras & Helpman(2005)把总部投入的要素密集度理解为生产函数的技术特征,它随时间而不断变化,因此对于新产品总部投入的要素密集度很高,而随着技术发展、生产经验的积累以及市场的深化,总部投入的要素密集度随时间而下降。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新产

品价值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在北半球生产,随着时间的变化,零部件转向南半球的分支机构生产,当产品生产成熟时,零部件生产外包给南半球的制造商。

Antras & Helpman (2008) 和 Acemoglu, Antràs & Helpman(2007)从国际贸易理论的视角,把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在契约的可执行程度的异质性引入企业生产组织模型。Antras & Helpman (2008)模型分析了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不可契约程度变化时企业边界的决策问题。他们认为如果南方国家中间投入品服务活动的可契约化程度得到了改善,企业可以在总部密集度更低点采用内制组织方式,而不需要通过外包来激励中间品供应商;如果总部服务活动的可契约化程度得到了改善,外包临界点处总部密集度更高。在政策层面上,如果政府通过制度的创新,加大制度供给,可以影响不同产业中企业边界,不过,政策对企业边界的具体影响要依政策改善总部服务可契约性或中间投入服务可契约性的程度而定。Acemoglu, Antras & Helpman (2007)模型把对产品的生产分为最终产品生产商与中间产品生产商,最终产品生产商可以选择如何分解生产程序,以便获得许多或极少的中间投入品。每种中间投入品必须通过不完全契约来获得。企业要在生产技术水平方面(其实质是对企业生产边界的选择)做出一个决策,企业生产技术由企业生产中使用的中间投入品的种类决定,由更多的中间商提供不同的中间投入品,专业化程度越高,生产率越高,则称生产技术越先进,但是采用越先进的技术需要越多的协调,所以成本也越高。企业在生产组织决策中要权衡效率与成本。他们研究发现:一个最终生产商做出最优技术选择,而这个选择依赖于行业特征和契约的不完全程度;更有效的契约制度导致对更先进生产技术(由生产过程中包含的中间投入品种类的多少来测量)的选择,而且中间产品间替代弹性较小的部门内,契约制度对生产技术的影响相对更大,这使得在契约制度更有效率国家的中间产品间替代弹性较小的部门具有相对生产率优势。

Grossman & Helpman(2004)利用 Holmstrom & Milgrom(1991)有关管理者激励的相关理论模型以及 Horn(1995)有关国际贸易中的最优管理者激励契约理论,从管理者激励的角度研究企业边界的内生选择问题。他们与 Antras & Helpman(2008)模型不同的是后者关注中间投入供应商专业化投资后的收益分配,而 Grossman & Helpman(2004)模型关注的是专业化投资前管理者努力水平的契约激

励问题;与 Antras & Helpman(2008)模型预测的不同,他们认为生产率最高与最低的企业将在南方国家采用外包的生产组织方式,生产率第二的企业在北方国家内制,其次是在南方国家 FDI。

Marin & Verdier(2002,2003,2005)把 Aghion & Tirole(1997)正式的权威与真实的权威理论融入到 Helpman & Krugman(1985)的国际贸易模型中,把 Aghion & Tirole(1997)模型与 D-S(1977)模型结合起来,分析企业内部权力的配置与生产组织边界的关系。他们研究发现,在中等竞争水平下,所有者通过放弃更多的控制权以换取下级管理者的积极性(首创精神)是有利可图的,因此,所有者把企业内部正式的权力配置给下级管理者,采用 A 型组织,实现组织活动的外包化。当外部竞争水平处于两个极端,那么企业将采用 P 型与 O 型组织结构,即所有者掌握控制权,实行组织活动的纵向一体化。

#### 四、简评

在对企业生产组织与贸易进行综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1)目前,有关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企业生产组织问题研究大多采用静态分析,我们认为针对该主题采用动态分析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最近,已经有学者开始进行动态化研究,比如:Naghavi&Ottaviano(2008)从企业异质性与契约可执行性角度研究动态离岸,Rodriguez-Clare&Andres(2007)在李嘉图比较优势研究框架中研究离岸问题,提出“定性梯队成长”模型,Monge-Naranjo(2008)研究跨国企业如何通过知识在发展中国家管理者与员工中的传播影响发展。(2)一些重要文献把组织经济学理论融入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实现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与一般均衡方法的结合。不过,目前被融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织问题还比较有限,还有很多企业组织问题没有进入国际贸易分析的框架。比如:企业组织经济学中的信息、激励以及权力配置问题,我们认为把这些组织问题融入国际贸易分析框架值得期待。(3)在实证研究方面,一些文献研究了企业生产组织决策对企业内贸易的影响,对贸易量与结构的影响,以及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等等。不过,许多理论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在福利影响上以及对可能的政策应对方面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可能。

#### 参考文献:

- Antras, P. (2003), "Firms, contracts and trade structu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1375-1418.

## 行为经济学视角的薪酬激励理论研究评述\*

李 强 纪志明

**内容提要:**薪酬激励是激励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近年来,随着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深入,薪酬激励理论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本文介绍了近期行为经济学关于薪酬决策程序、薪酬互动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分析了基于公平偏好的薪酬激励模型的特点,以及行为经济学在薪酬激励的个性化反应及其调节效应方面研究的新进展,并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简要评论。

**关键词:**薪酬激励 行为经济学 激励理论

传统经济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假设人是纯粹自利的,行为决策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否认社会心理因素对行为决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薪酬激励理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近年来,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大量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人的行为是受到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的。行为经济学突破了传统“经济人”假设的束缚,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将社会心理因素融入薪酬激励理论的

研究中,分析了社会心理因素对薪酬激励效应的影响。

### 一、关注薪酬决策程序的非工具性动机研究

DeConinck & Stilwell(2004)认为,薪酬的激励作用主要是由感知到的分配程序(薪酬决策程序)决定,而非由分配结果决定。只要人们有过程控制的权利,不管最终结果是否对自己有利,都会对人们

Antras & Helpman(2004), "Global sourc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CXII:552-580.  
Antras, Garicano & Rossi-Hansberg(2006), "Offshoring in a knowledge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1):31-77.  
Antras, Garicano & Rossi-Hansberg(2008), "Organizing offshoring: Middle managers and communication costs", in: E. Helpman et al. (eds.), *The Organization of Firms in a Global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aldwin & Robert-Nicoud(2007), "Offshoring: 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s on wages, production and trad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2991.  
Grossman & Helpman(2004),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LXIII:237-262.  
Grossman & Maggi(2000), "Diversity and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C:1255-1275.  
Grossman & Rossi-Hansberg(2008), "Trading tasks: A simple theory of offshor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5):1978-97.

Kremer & Maskin(1996), "Wage inequality and segregation by skill", mimeo, Harvard University.  
Kremer & Maskin(2006),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mimeo Harvard University.  
Lucas, R. (1978), "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IX:508-523.  
McLaren, J. (2000), "Globalization and vertical struc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1239-1254.  
Marin & Verdier(2008), "Power inside the firm and the market",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6(4):752-788.  
Monge-Naranjo, A. (2008), "Foreign firms, domestic entrepreneurial skills and development", mime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Rodriguez-Clares, A. (2007), "Offshoring in a Ricardian world",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203.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香伶)

\* 基金项目: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7CJY022)。